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中國銀行行史

下卷

中國銀行行史編輯委員會編著

中国 银行 行 史

(1912—1949 年)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5·北京

责任编辑：赵燕红 谷晓虹 左焕宓 梁宝忠

责任校对：潘 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银行行史/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著.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5. 9

ISBN 7—5049—1514—9

I. 中…

II. 中…

III. 银行—经济史—中国—民国

IV. F832. 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6543 号

出版：中国金融出版社

发行：

社址：北京广安门外小红庙南街 3 号

邮编：100055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国防大学第二印刷厂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64.5

字数：800 千

版次：1995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80 册

定价：72.00 元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卜 明

副主编 王德衍 金德琴 崔延绪 凌 志
雷祖华 屠建基 黄涤岩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孔祥贤	叶绪华	龙安定	许介文
伍锡惠	邱敏姝	陈则平	宋 庆
张知非	张毓昌	吴念鲁	吴瑞章
吴骏生	姚蕴芳	黄昌年	黄荫初
端木树勋	解灿煊	薛镜澄	魏安文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列)

方善桂 陈 纭 项克方 崔 平

编辑部

主 任 叶绪华

副主任 端木树勋 伍锡惠

撰稿人 (按姓氏笔画排列)

叶绪华	许介文	伍锡惠	邱敏姝
吴瑞章	姚蕴芳	黄昌年	端木树勋

下 卷

抗日战争时期

(1937—1945 年)

历史背景

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尖锐起来，转嫁危机和争夺市场的斗争空前剧烈。德、意、日三国突出地发展军事工业和法西斯化的结果，使三国经济转向战时经济轨道，引发了要以武力重新分割世界，重新瓜分势力范围和殖民地的斗争。日本帝国主义乘英、法等国忙于应付德、意两国的侵略行动而无暇东顾的机会，先后与德、意两国缔结“防共协定”，加紧向我华北扩张，妄图完全征服中国，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

蒋介石执行的内战、独裁和对日本不抵抗的政策，纵容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骄横气焰，也加深了中国人民对民族危机的认识，激发了抗日救亡的决心。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中日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于1936年3月向国民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12月又力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条件，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中国人民奋起抗日。在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在北平、上海、台儿庄、徐州等地进行了有组织的抵抗，取得过如台儿庄大捷等胜利。但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片面抗战和单纯防御的战

略方针，使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溃退，广大国土沦于敌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分别在华北、华中、华南建立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根据地的军民成了坚持抗日的中流砥柱，逐步开辟和扩大了新的抗日根据地，打击与牵制了 60% 以上的侵华日军和 90% 以上的伪军。

抗日战争是中国以一个军事上、经济上的弱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在国际上得道多助。苏联明确地支持中国抗日战争，1937 年 8 月，与国民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派军事顾问及航空志愿队来华。英、美等国则一方面不满意日本损害了它们的在华利益，给中国一定援助；另一方面又想寻求机会与日本妥协，企图牺牲中国的部分领土、主权，缓和同日本的矛盾。一直到太平洋战争发生，英、美对日宣战，这种情况才有改变。

在旧中国一些城市中存在过的“租界”，原是帝国主义国家对华进行侵略和罪恶活动的据点。抗日战争前期，租界虽处于日军包围之中，但由于英、美、法等国与日本之间存在矛盾，日军势力还不能深入租界，国民政府可以利用租界与日伪进行金融、经济等方面的斗争。这也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地位在特定的条件下所形成的特殊现象。

由于战争的分割，在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敌占区、国统区、解放区犬牙交错同时并存的局面。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采取“以华制华”的手段，在各个沦陷区拼凑傀儡政权，并对蒋介石进行政治诱降；另一方面又实行“以战养战”政策，对沦陷区人民进行残酷的经济掠夺，用以支持它的侵略战争。国民政府在统治区域日益缩小的情况下，为适应长期战争需要，推行战时经济措施，发展后方经济，充实抗战实力；同时又派重兵包围解放区，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抗日根据地则是在与日、伪、蒋进行

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艰苦斗争中逐步建立发展起来。因此，三个不同地域之间的物资封锁、经济斗争和货币斗争十分复杂尖锐。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银行在协助政府安定金融，调整经济；调运钞券，供应军需；筹集资金，支持后方经济发展；平衡汇市，与日伪进行货币斗争；以及组织侨汇，扶持出口，为国家集中巨额外汇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但由于国民政府加强金融垄断和通货恶性膨胀所带来的影响，中行本身也遭到削弱，实力大降。这一切，对中行的地位、作用和发展都有深刻影响。

第十四章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银行机构的变动

第一节 总管理处的搬迁

一、几次名义上的移设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财政部于9月25日密令中、中、交、农四行总行移设于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中行随即对外公告，总管理处遵令迁京，并在南京分行挂了总管理处的牌子，添设了办公处，但实际上并没有在那里办公。以后，由于环境变化和在海外设行办理登记手续需要填报总行所在地等原因，中行对总处所在地曾几次决议，即1937年11月由上海迁汉口，1938年10月迁广州，同年11月迁昆明，但都是名义上的，并没有真正移设^①。

二、成立“总驻汉处”和“总驻港处”

“八·一三”战事爆发，中行总管理处为安全起见，由上海汉口路50号（在原公共租界内）迁至上海分行霞飞路办事处（在原法租界内，今淮海中路）楼上办公。后来得到财政部的许可，另在汉口、香港设立临时机关。当时曾拟定：（一）在汉口设立总管理处驻汉办事处，略名“总驻汉处”，管理全体分支行处业务、帐务及事务；（二）在香港设置总管理处驻港办事处，略名“总驻港处”，办理有关全行外汇及发行集中事项；（三）储蓄部随同总驻

^① 中行档案：1941年10月8日总秘书戴志骞致各分支行通函。

汉口一并移设汉口，国外部及信托部随同总驻港处一并移设香港^①。1937年11月“总驻港处”在香港成立，地点在香港德辅道中6号广东银行大楼二楼。董事长宋子文、总经理宋汉章、副总经理贝祖诒等及总处大部分处、室均移驻香港办公，成为当时中行的实际指挥中心。至于“总驻汉口处”并未成立，但是总管理处的部分处室如总帐室一度曾移设汉口，储蓄部也曾迁往汉口，都为时不长。1937年12月储蓄部迁香港；1938年1月，总帐室迁重庆，1939年3月1日移往昆明，称“驻滇总帐室”，同年12月5日又移设重庆。

中行总处移设香港，主要是利用香港交通、通讯等比较发达的有利条件，便于联系上海及华中、华北，在金融方面与敌人进行斗争；也有利于吸收南洋、欧、美各地侨汇及配合进口作战物资，以增长抗日实力；是非常时期的一项权宜措施。总处并通知各分支行处在对外公告或广告中，一律不得登载总处所在地^②。所有总处收发文件一律另行加封附于香港分行信件中，由香港分行中转。

三、移设重庆

1939年9月，欧战爆发，德国与英、法等国宣战。同时，国民政府颁布《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规定中、中、交、农四行总行未移设于国民政府所在地者，应在最近期内移设。中行总处奉命由香港内迁重庆办公。因当时重庆空袭频繁，中行人员众多，券料帐册尤须妥善安置，所以在调第一批人员迁渝办公的同时，在重庆郊区石桥铺、枣子岚垭、牛角沱、丁家寨、玉灵洞等处租建办公及宿舍用房，并开凿防空洞及保管库，以策安全，

① 中行档案：1937年10月常董会议关于拟在汉口、香港添设临时管理机关的议案。

② 中行档案：1938年11月4日总驻港处业字第184号通函。

然后分批组织内迁。并留部分高层人员和必要人员在港，保留总驻港处名义，以资呼应。当时法越尚维持中立状态，大部分人员取道海防，由滇越路经昆明转重庆，也有一部分员工暂留昆明、下关、保山等处办公，借以疏散。以后，日本加紧南侵，派兵入越，以致有一部分经越返国员工中道折回，改由上海取道宁波辗转赴渝。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沦陷，留港办事人员陷敌。所幸重要文件、帐册、券料、用品已先期运入内地，未遭损失。继而全部员工亦历尽艰险，陆续偷越敌人封锁线，分别经澳门、广州湾、深圳等口岸进入内地，回到总处工作^①。

中行章程原规定设总经理一人，抗战期间，行务日趋繁重，已无法适应非常时期的需要。因此于1937年12月增设副总经理一人，聘请董事贝祖诒充任（1938年4月提请董事会通过）。1942年12月经常董会议通过再增设副总经理一人，聘请董事卞寿孙充任。

第二节 沦陷区的机构

抗日战争发生不久，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财政部于1938年2月26日，以汉钱字第35966号密函四联总处（其全称为“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银行联合办事总处”，成立的详情见第十八章第一节），颁布金融分区处理办法。其中对沦陷区的金融，规定：“一、凡在陷敌区域内，中、中、交、农四行之任何一行或全体，无论敌人威胁利诱，均不得与各该区域内伪组织、伪银行合作及参加伪银行之股本；二、各该区域内四行或任何一行，如被伪政权、伪银行威胁不能拒绝时，应临机应变，多方设法以

^① 中行档案：1944年1月总处向第22次董事会常会报告。

拖延之；三、各该区域内，四行如以拖延方法应付无效，应即商拟一致破裂办法，请示总行转部核定飭办，但遇急迫不及转知核定时，得由总行飭令照办报部备查”。规定还要求各行应妥慎监管本行财产，如发现敌人有侵占意图时，应将可转移的动产或债权移转于可信托的银行；能收回的债权应积极收回一部分或全部；对伪银行发钞应尽力设法制造障碍等^①。处在沦陷区的中国银行分支机构，即遵照这一规定执行。有的收缩业务，继续维持；有的利用租界与日伪作金融斗争；部分机构停业清理。

一、收缩业务，继续营业

以青岛分行和北平支行为例。

抗日战争爆发后，青岛形势渐趋紧张。7月底8月初一段时间，青岛分行存户来行提取存款的，每日不下三五百人，每日付出存款约10万元。随着内迁的商民陆续离青，提存者逐渐减少，但汇兑业务却显著增加，仅电汇一项，就较平时增加15—20倍。这是由于青岛其他银行的业务大都趋于停滞，汇款集中到中行所致。当时青岛中行库存较丰，除供给同业外，还封存数十万元交麦加利银行（即渣打银行）代为保管。

青岛地处沿海，日军随时可能入侵。为业务安全起见，青岛分行决定在济南支行内设立“驻济临时办事处”。自1937年8月20日起，所有青岛分行辖属各行、处对管辖分行的帐务，就一律划归该处办理。1938年1月10日日军在青岛登陆后，青岛分行立即收缩业务，但仍维持营业。其辖属机构能够维持营业的，仅有济南、烟台、潍县、威海卫等四行处，经营情况都非常艰难。如济南支行，当时员工有50余人，库存现金3万余元，存款500余万元，但每日传票不足200张，每日开支需6000元左右，很难维持，一度形成停业。1938年2月日本特务机关逼迫济南支行复业。

^① 中行档案：1938年3月11日总驻港处转发四联总处第59次会议决定的函。

济南治安维持会出面成立“济南市金融调整委员会”，该会决议将济南支行仓库押品小麦折价 60 余万元，由日商三菱洋行购买，收回押款作支行的营运资金，支行于 3 月 1 日正式复业。复业不久，日伪当局又采取了种种限制业务的做法，并强行封存支行的法币库存 13 万元。1941 年 7 月因英、美冻结日本资金，日伪特务机关限令济南中行于 29 日停止营业。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青岛、济南、烟台、潍县、威海卫五行处均被日军接管，被迫停业清理。日军派大阜银行顾问金森为清理员接管了青岛中行，行屋及其他房地产作价 250 万元售予大阜银行，中山路行屋做了大阜银行行址，所得款项，作为清理存款之用。济南中行由日本陆军特务机关下达命令，作为敌产予以接收，办公室、地库及行员宿舍等均被查封占据^①。

北平于 1937 年 7 月 29 日沦陷，居民离北平南下者增多。北平支行因应付大量提存，现钞紧缺，要求天津分行运钞接济。天津分行除商请当地治安维持会及公安局转向日军部接洽准予调运现钞及保障安全外，在日军部迟迟未作答复前，还委托东方汇理银行转托法国兵营于 8 月下旬两次携带现钞 10 万元交北平支行应急。1938 年初，日本宪兵队通过北平市银行同业公会调查了解在北平营业的中、中、交、农和盐业、金城、大陆等 7 家银行的情况，企图实现对北平金融业的控制。1938 年 3 月华北伪政权成立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总行设于北平，发行“联银券”，与法币等值流通。同时规定，中、交两行发行的印有华北地名的钞票准予继续流通 1 年。1938 年 8 月，伪华北临时政府行政部又公布中、交两行纸币贬值 1 成，1939 年 2 月起再贬 3 成。3 月 10 日起禁止法币在华北流通，3 月 11 日日伪派警宪到北平中行查缴库存法币。当时北平中行法币库存近 32 万元，其中天津地名券 13 万

^① 《青岛分行行志》第 44—47 页；《济南中国银行史》第 20—22 页。

元，上海地名券及其他银行杂券 19 万元，已切角销毁 28 万元，还有破损券及新近收进未及切销的近 4 万元，被出据收走。由于日伪采用行政压力，使北平中行的经营直接受到冲击和限制。1939 年 8 月到 1941 年 8 月，北平中行陆续将原有的 5 个市区办事处裁撤，业务也随之显著下降。1937 年时，各项存款余额有 2237 万元，到 1941 年仅剩有 808 万元，减少了 64%；贷款由 1937 年的 59 万元减少到 1940 年的 22 万元，减少了 63%，主要还是和其他银行联合贷放，缩小到最少程度。1937 年利息收入 21 万元，1941 年上期仅有 1 万多元，减少了 90%。4 年多的时间内，北平支行累计亏损达 434 万元，维持营业是相当艰难的^①。

东北三省的中行，在日军占领后，也有部分行处继续营业，有关情况请参阅第十二章。

二、利用租界与日伪斗争

1937 年 11 月，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上海租界虽处于日军包围之中，仍有其特殊地位。财政部命令中、中、交、农四行保留上海租界内的机构，继续执行分行业务。财政部在发给四行总行的电文中说：“目前沪市情形特殊，交通梗阻，原可易地营业。但本部为谋沪市中外商民交易便利，及照旧办理汇兑买卖，以安定市面金融起见，相应电请贵行转饬上海分行依照法令规章规定，执行分行业务，以利市面”^②。到 1941 年 11 月，驻沪美军即将撤走时，四联总处仍要求上海四行继续坚持营业。该处在电文中说：“查沪四行历年不避艰危，维持营业，与整个国家金融经济关系至巨。此次沪美军撤退，今后各行处境日益臻困难，唯为求前后方金融脉络流通贯注，以维持东南数省之金融经济关系，并杜绝敌伪抵隙踏瑕起见，非至万不得已，沪四行似仍应坚持镇静，继续

① 《北京的中国银行》中国金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01—303 页、309 页。

② 《中行月刊》第 15 卷第 4—5 期合刊。